

# 浅谈《春秋公羊传》

作者：西北大学 张 海

[摘要] 《春秋公羊传》是一部解释《春秋》的重要著作，它与《春秋左氏传》、《春秋穀梁传》并称春秋三传。《公羊传》是今文经的重要典籍，对《春秋》的解释重在发挥“微言大义”，两汉时期一直处于官学地位，对汉代学术、政治、文化等领域产生深刻影响。

[关键词] 春秋公羊传；春秋三传；今文经；微言大义

《春秋》本是先秦时代各诸侯国历史的通称。墨子说：“吾见百国《春秋》。”后来只有鲁国《春秋》流传下来，《春秋》于是成为鲁国历史的专名。杜预《春秋左传序》：“《春秋》者，鲁史记之名也。”《春秋公羊传》，亦称《公羊春秋》、《公羊传》，成书于战国时代，是一部解释《春秋》的重要著作。它与《左传》（又称《左氏春秋》、《春秋左氏传》）、《穀梁传》（又称《穀梁春秋》、《春秋穀梁传》）并称春秋三传，是今文经学的重要典籍。

## 一、《公羊传》的缘起

据文献记载，《公羊传》的作者是战国齐国人公羊高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载：“《公羊传》十一卷。公羊子，齐人。”戴宏《公羊传序》、颜师古《汉书注》认为公羊子名高。《公羊传》为公羊氏一家世代相传，起初只是口头传授，没有文字定本，后经公羊学者传承，至西汉景帝时由胡毋生协助公羊寿“著于竹帛”，写定成书。胡毋生是景帝时博士，年老辞官后回到齐地开馆授徒。“齐之言《春秋》者多受胡毋生，公孙弘亦颇受焉。”胡毋生“与董仲舒同业，仲舒著书称其德”。董仲舒与胡毋生同为汉代公羊学大师。《史记·儒林列传》：“故汉兴至于五世之间，惟董仲舒名为明于《春秋》，其传公羊氏也。”“言《春秋》于齐鲁自胡毋生，于赵自董仲舒。”董仲舒很重视《春秋》，他说：“不学《春秋》，则无以知前后旁侧之危，则不知国之大柄、君之重任也。”“《春秋》记天下之得失，而见其所以然之故，其幽而明，无传而著，不可不察也。”他还引用《史记·太史公自序》，《春秋》“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，以为天下仪表。贬天子，退诸侯，讨大夫，以达王事而已矣。”《春秋》的风格多为简单记事，而董仲舒悉心钻研《春秋》和《公羊传》并加以发挥，继承和发展了公羊学派解释儒家典籍的思想和方法。他作《春秋繁露》把《公羊传》的思想理论化、系统化，建构了自己独具特色的公羊学体系。

## 二、《公羊传》对《春秋》的解释

公羊学派通过《公羊传》解释《春秋》表达自己的观点，他们认为《公羊传》忠实地阐发了《春秋》的思想内涵。孔子依据鲁国历史所作《春秋》文字简略，常常只用几个字表示褒贬，有“大义”存于其中。《公羊传》从《春秋》的语句中将“大义”发掘出来并加以阐明，重在发挥“微言大义”，这与注重史实记载、补足史料的《左传》有很大不同。

如《春秋·隐公元年》载：“夏五月，郑伯克段于鄢。”《左传》详尽叙述郑庄公克段于鄢的原因、经过和结果。而《公羊传》则不同，它重点在于对史实进行评论，不就事件本身展开



论述。《公羊传》载：“克之何者？杀之也。杀之，则曷为谓之克？大郑伯之恶也。曷为大郑伯之恶？母欲立之，已杀之，如勿与而已矣。段者何？郑伯之弟也。何以不称弟？当国也。其地何？当国也。齐人杀无知何以不地？在内也。在内，虽当国不地也；不当国，虽在外亦不地也。”

《公羊传》所解释的《春秋》以“仁义”作为道德评判标准，以“不害人”为变通原则。如《公羊传》载，宋襄公不击半济、不鼓不成列、不重伤、不擒二毛是“仁义”之举，并不因其兵败受伤而讥讽。相反，对于楚成王背信毁约、俘获宋襄公则大加贬斥。《公羊传》认为在人面临生死存亡的情势下，可以允许违反礼法制度的权变行为，但要以“自贬损，不害人”为基本原则。它言道：“权者何？权者反于经，然后有善者也。权之所设，舍死亡无所设。行权有道，自贬损以行权，不害人以行权。杀人以自生，亡人以自存，君子不为也。”

东汉经学家何休在《春秋公羊传解诂》中详尽阐释了《公羊传》解释《春秋》的微言大义，他在该书《序》里说：“往者略依胡毋生条例，多得其正，故遂隐括使就绳墨。”《春秋公羊传解诂》是两汉公羊学的总结，它保存了公羊学派许多条例、义旨，被后世儒生奉为经典。此外，公羊学的灾异学说也是影响汉代学术的一个重要方面。《春秋》记载了许多自然灾害和异常现象，如陨石、彗星、地震、山崩、瘟疫等。公羊学派认为这些都是人间即将出现祸乱的征兆，所谓“以此见人之所为，其美恶之极，乃与天地流通而往来相应。”汉代儒生推测灾异，常将某些不寻常的自然现象同《春秋》的记载相比附。灾异学说的兴盛，肇始于董仲舒。如《汉书·五行志》的大部分篇幅，就是董仲舒和刘向等人对《春秋》中各条灾异的推断。

### 三、《公羊传》在春秋三传中的地位

春秋三传之一的《穀梁传》也是一部解释《春秋》的重要著作。传说孔子的弟子子夏口头传授给谷梁赤，谷梁赤记录下来，后经汉代学者系统整理成书。《穀梁传》与《公羊传》同属今文经。今文经是汉代儒生用隶书记录的儒家著作，大都没有先秦古文原本，而由战国以后的儒者师徒、父子相传，到汉代才写成定本。《穀梁传》的传授，《汉书》从申公写起，申公传瑕丘江公，江公传子至孙为博士。据史载，汉武帝曾让江公和董仲舒辩论，江公口讷，不如董仲舒，又适逢公孙弘为丞相，公孙弘治《公羊传》，他比较江、董两人的经义，认为董仲舒的学说更适宜当时的政治需要，于是向汉武帝大力推荐公羊学，武帝最终确立《公羊传》为官学，公羊学从此兴盛，而穀梁学逐渐衰微。与公羊学相比，穀梁学更加重视礼乐教化，推崇仁德之治，强调宗法情谊。而公羊学经过董仲舒的发挥，大一统等学说得到全面阐释和广泛宣传，迎合了统治者的政治需要，得到官方的大力扶植。

汉以后，《左传》流传不绝，相传为鲁国史官左丘明所作，是《春秋》三传之一，属于古文经。古文经是指战国时代用东方六国文字书写的儒家经典。研究今文经的学问称为今文经学，研究古文经的学问称为古文经学。今文经学重在阐发《六经》中所包含的微言大义，重视《公羊传》，但是容易与谶纬学说结合，表现出浓厚的神学色彩。古文经学则重考察研究史实、材料，重视《左传》，它向阐述古制、古文字方向发展，学风朴实。

今古文经学关于《公羊传》与《左传》的争论十分激烈。东汉章帝时，贾逵奉旨比较《公羊传》和《左传》，“具条奏之”，提出意见。一、《左传》与《公羊传》相比，有同有异，《左传》有“义长”之处，应当立于官学。二、重视《左传》的“义”，有利于“安上理民”。三、《左传》合于图谶，利于解决汉代帝王统系问题。与贾逵同时代的李育以治《公羊传》闻名，“常避地教授，门徒数百。”他认为，《左传》“不得圣人深意”。“前世陈元、范升之徒更相非折，而多引图谶，不据理体，于是作《难左氏义》四十一事”。在章帝建初四年（公元79年）的白虎观会议上，“育以《公羊》义难贾逵，往返皆有理证，最为通儒。”汉代最重《春秋》，有孔子借《春秋》“为汉制法”的说法，而在春秋学中首重公羊学，率先将《公羊传》立于官学。《左传》欲立博士，取得与《公羊传》同等地位，必然会引起激烈争辩。



公羊学派以《春秋公羊传》为核心系统阐发和改造了《春秋》的思想内容，在汉代经学领域占有重要地位，同时也加深了儒学的政治化，它对儒学成为官方学术，被定为一尊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。不仅如此，公羊学还广泛涉及汉代社会、文化等领域，对后世儒学的发展产生诸多方面的影响。

[参考文献]

[1] 王维堤,唐书文.春秋公羊传译注[M].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4.

[2] 李学勤.春秋

